古今风云人物集（四）

李大伟 编著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白居易 1
阎立本 8
李思训 10
吴道子 12
贾耽 14
孙思邈 15
陈少游 16
万宝常 23
宇文恺 24
何稠 25
赵普 26
石守信 27
潘美 27
杨业 28
寇准 29
苏轼 30
王安石 32
包拯 39
狄青 40
蔡京 41
宗泽 42
李纲 43
文天祥 44
韩世忠 45
张居正 46
海瑞 47

刘义庆 47
朱高炽 48
朱瞻基 50
皇太极 51
玄烨 55
多尔衮 61
鳌拜 62
隆科多 63
年羹尧 64
岳钟琪 65
张廷玉 66
田文镜 67
福康安 67
林则徐 68
关天培 71
陈化成 72
洪秀全 73
杨秀清 74
韦昌辉 75
石达开 76
陈玉成 77
杜文秀 78
马化龙 80
张秀眉 81
李秀成 83
赖文光 84
张乐行 85
慈禧太后 86

聂士成 89
董福祥 90
刚毅 90
谭嗣同 91
冯子材 94
张之洞 95
僧格林沁.....97
李鸿章 98
颇罗鼐 99
左宗棠 100
曾国藩 101
钱能训 105
曹锟 106
徐光启 107
李之藻 108
段祺瑞 109
冯国璋 111
伍廷芳 113
黄兴 115
張謇 115
唐廷枢 116
徐润 118
盛宣怀 119
黎元洪 121
孙中山 123
秋瑾 124
徐锡麟 126
陈天华 127

邹容 129
章炳麟 130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白居易

唐代诗人。字乐天，号香山居士、醉吟先生。祖籍太原(今属山西)，曾祖父白温迁居下邽(今陕西渭南)，遂为下邽人。晚年官太子少傅，谥号“文”，世称白傅、白文公。祖父锽、外祖陈润俱善诗。父季庚，做过彭城县令，徐州、襄州别贺。生平。入仕以前，自代宗大历七年(772)，至贞元十五年(799)，白居易生于郑州新郑(今属河南)。自幼聪慧，5、6 岁学作诗，9 岁熟悉声韵。11 岁时，因两河藩镇战乱，由荥阳逃难到徐州符离(今安徽宿县北)，不久又南下到越中，投奔在杭州作县尉的堂兄。5、6 年的颠沛流离生活中，白居易接触到民间疾苦，并受到当时任苏州、杭州刺史的两位诗人韦应物、房孺复的影响，作有《江南送北客因凭寄徐州兄弟书》、《赋得古原草送别》等诗篇，15、16 岁时，立志应进士举，刻苦读书，口舌成疮，手肘成胝。后来，父死母病，靠长兄白幼文的微俸维持家用，奔波于鄱阳、洛阳之间，生活比较艰苦。初仕至遭贬。

自贞元十六年(800)，至元和十年(815)。贞元十六年，白居易 29 岁，进士及第。十八年(802)，又与元稹同时考中“书判拔萃科”。两人订交，约始于此，后在诗坛上齐名，并称“元白”。十九年春，授秘书省校书郎。永贞时(805)，王叔文、韦执谊实行政治革新，白居易曾向韦上书，建议广开言路，选拔人才，惩恶赏善，举贤任能，不失时机地迅速改革。但不久，王、韦等被贬，改革失败。他的建议未及采用，写有《寓意》等诗表示

惋惜。元和元年(806)，罢校书郎，撰《策林》75 篇，对社会政治各项重大问题所提治理方案，是研究他的政治思想的重要资料。这年中“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授盩厔(今陕西周至)县尉，作《观刈麦》，《长恨歌》。元和二年，帖集贤院校理。十一月授翰林院学士。次年授左拾遗。五年，改京兆府户曹参军，均依旧充翰林学士。草拟诏书，参预国家机密。在儒家“兼济”思想的指导下，他不怕得罪权贵近幸，连续上书论事，如《奏请加德音中节目》、《论制科人状》、《论于裴均状》、《论和籴状》、《奏阌乡县禁囚状》等，都是关系国家治乱、人民生活的重要文件。与此同时，他还自觉地以诗歌作为“补察时政”、“泄导人情”的武器，促进新乐府运动，写了大量的讽谕诗，和他在政治上的努力相辅而行。但由于朝政日趋腐败，他的这些奏状和诗歌反而招来当权者的忌恨与打击。元和六年，白居易因母丧居家，服满返京任太子左赞善大夫。元和十年，两河藩镇割据势力联合叛唐，派人刺杀主张讨伐藩镇割据的宰相武元衡。白居易率先上疏请急捕凶手，以雪国耻。但却被腐朽的官僚势力攻击为越职言事，并捏造“伤名教”的罪名，将他贬为江州(今江西九江)司马。这对他是个沉重的打击。贬江州以后的内外迁调。

自元和十一年(816)，至大和二年(828)。白居易到江州后的第二年，写下《琵琶行》。诗中通过一个擅奏琵琶的长安名妓沦落江湖的不幸身世，寄托了自己政治上失意的苦闷。在这之前，他已经看到朝廷的种种黑暗，萌生过及早抽身的念头。经过这次打击，思想更从“兼济”急遽转向“独善”，决心要做到“宦途自此心长别，世事从今口不言”(《重题》)；“面上灭除憂喜色，胸

中消尽是非心”(《咏怀》)。但他并没有辞官归隐，而是选择了一条“吏隐”的道路，一边挂着闲职，一边在庐山盖起草堂，与僧朋道侣交游，以求知足保和，与世无忤。与之相适应，描写闲静恬淡境界、抒发个人情感的闲适诗和感伤诗，便开始多起来，而前期那种战斗性强烈的讽谕诗则比较少见了。元和十三年，改任忠州刺史。十五年，召还京，拜尚书司门员外郎，迁主客郎中，知制诰，进中书舍人。因国事日非，朝中朋党倾轧，屡次上书言事不听，于长庆二年(822)请求外任，出为杭州刺史。后又做过短期的苏州刺史。在杭州时，曾修筑湖堤，蓄水灌田千余顷；并疏浚城中六口井，以利饮用。离苏州日，郡中士民涕泣相送。文宗大和元年(827)，拜秘书监。次年转刑部侍郎。退居洛阳的晚年生活自大和三年(829)，至会昌六年(846)。白居易从 58 岁开始，定居洛阳。先后担任太子宾客、河南尹、太子少傅等职。会昌二年(842)，以刑部尚书致仕。他在洛阳过着饮酒、弹琴、赋诗、游山玩水和“栖心释氏”的生活。时常与名诗人刘禹锡唱和，时称“刘白”。他在舒适的晚年仍然时常想到人民。73 岁时，还出资募人凿开龙门八节石滩，以利行船。两年后病终。葬于龙门香山琵琶峰(见彩图河南洛阳白居易墓)。诗人李商隐为撰墓志。今已辟为游览胜地。诗歌理论。白居易的思想，综合儒、释、道三家。立身行事，则以儒家“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指导思想。他的“兼济”之志，主要是实行儒家的仁政，但也包括黄老之说、管萧之术和申韩之法，他的“独善”之心，吸取了老庄的知足、齐物、逍遥观念和佛家的“解脱”思想。《自觉》二首其二说：“我闻浮图教，中有解脱门。”求得身退心安，无所往而不适。当他受皇

帝信任的时候，在政治上直言极谏，无所忌讳，敢作敢为，诗歌创作便积极反映民生疾苦，为补察时政服务；当他失去信任而不能有所作为时，便请求放外任或做分司闲官，远嫌避祸，以诗、酒、禅、游自娱，诗歌创作则主要表现个人感受。无论达和穷，他都离不开诗。白居易一生不仅留下近 3000 篇诗作，还提出了一整套诗歌理论。他把诗歌比作果树，提出了“根情、苗言、华声、实义”(《与元九书》)的著名论点。情是诗的内容，言和声是诗的表现形式，义是诗的社会效果。他分析了诗歌创作中的感情活动，说：“大凡人之感于事，则必动于情，然后兴于嗟叹，发于吟咏，而形于歌诗矣”(《策林》六十九)。又说：“乐者本于声，声者发于情，情者系于政”(《策林》六十四)。认为情感活动并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缘起于社会生活中的“事”，密切联系于当时代的“政”。因而，诗歌创作不能脱离现实，必须来源于生活，取材于现实生活中的各种事件，反映着一个时代的社会政治状况。白居易继承了中国古代一贯以《诗经》为主旨的比兴美刺的传统诗论，十分强调诗歌的现实内容和社会作用。他说：“文章合为时而着，歌诗合为事而作”(《与元九书》)。又说：“为诗意如何？六义互铺陈；风雅比兴外，未尝着空文。”(《读张藉古乐府》)所谓“为时”、“为事”，就是指“救济人病，裨补时阙”。所谓“六义”、“风雅比兴”，则是指诗歌指陈时政的美刺作用。由于当时社会黑暗和政治腐败，他在“美刺”中更着重“刺”的一面，强调诗歌批评社会政治的功能，要求“唯歌生民病”、“句句必尽规”(《寄唐生》)，“上以纫王教”，“下以存炯戒”(《策林》六十八)，指出“欲开壅敝达人情，先向歌诗求讽刺”(《采诗官》)。在他

看来，诗歌创作只有发挥了这种功能，引起当权者的注意，对国家政治和人民生活的改善起一点作用，才算达到了写作目的，否则不过是些“嘲风雪，弄花草”的“空文”。与上述理论相适应，在诗歌表现方法上，他提出了一系列原则：“辞质而径”，辞句质朴，不加文饰，表达直率，不绕弯子；“言直而切”，直书其事，不作隐讳，切近事理，说尽说透；“事核而实”，内容真实，经得起查考，不说空话，不加虚夸；“体顺而肆”，文字流畅，容易上口吟诵，便于配乐传唱(《新乐府序》)。他自己的一部分诗作，正是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实践的。在中唐阶级矛盾和统治阶级内部矛盾十分尖锐的情况下，这种诗歌理论对促使诗人正视现实、关心民病，是有积极意义的。对大历以来诗坛上逐渐偏重形式的诗风，也有针砭作用。但是，他过分强调诗歌创作服从现实政治需要，有时把诗歌变成押韵的谏章，又是不恰当的。有时他运用这种理论来批判谢灵运、陶渊明、谢朓、李白等著名诗人，便不免显得偏颇和狭隘，甚至连杜甫也只剩下三、四十首值得肯定的好诗(《与元九书》)。同样，如果一味强调“辞质而径”等诗歌的表现方法，势必束缚诗歌艺术的创造，拘限诗歌风格的多样，难免有浅率之弊，因而受到晚唐诗人杜牧及宋代一些诗人的批评。文学创作。白居易在江州时，曾整理、编集自己的诗歌作品，分成讽谕、闲适、感伤和杂律四大类。据其自述，讽谕诗是他“自拾遗来，凡所适、所感，关于美刺兴比者，又自武德讫元和，因事立题，题为新乐府者”，闲适诗是“或退公独处，或移病闲居，知足保和，吟玩情性者”；感伤诗是“事物牵于外，情理动于内，随感遇而形于叹咏者”；杂律诗则是“五言、七言、长句、绝句，

自百韵至两韵者”。大体上，前三类是古体诗，最后一类是近体诗；前三类中大致以内容区分，但也有参互交错的。在这四类诗中，白居易自己比较重视讽谕诗和闲适诗。他认为讽谕诗反映了“兼济之志”，闲适诗显示出“独善之义”，都是他的人生目标的直接体现。感伤诗和杂律诗则“或诱于一时一物，发于一笑一吟，率然成章，非平生所尚”(《与元九书》)。白居易诗歌创作中最精华的部分，是他的讽谕诗，其中包括《新乐府》50 首、《秦中吟》10 首等代表作。这些诗篇广泛反映了中唐时期社会生活各方面的重大问题，着重描写了现实的黑暗和人民的痛苦，如《观刈麦》、《采地黄者》、《重赋》、《杜陵叟》等写农夫的辛苦和赋税剥削的沉重；《宿紫阁山北村》、《卖炭翁》等写宦官的飞扬跋扈和宫市给人民带来的苦难；《轻肥》、《歌舞》、《红线毯》、《两朱阁》等揭露豪门贵族的穷奢极侈；《新丰折臂翁》、《缚戎人》、《城盐州》、《西凉伎》等反映边防问题和战争给人民带来的灾难；《涧底松》、《赢骏》、《悲哉行》、《谕友》等为门第限制下人才受压制而抱不平；《井底引银瓶》、《议婚》、《母别子》、《上阳白发人》等为礼教束缚下妇女的悲惨命运发出控诉；《伤友》、《和雉媒》、《天可度》等抨击世风衰败和人情浇薄；《海漫漫》、《梦仙》等讽刺迷信神仙的虚妄愚昧。这些作品都称得上心苦力勤，直气凛然。在广泛反映现实的基础上，诗人对不合理的现象痛下针砭，如“夺我身上暖，买尔眼前恩”(《重赋》)；“地不知寒人要暖，少夺人衣作地衣”(《红线毯》)；“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杜陵叟》)，措辞激切，毫无顾忌，突破了儒家“温柔惇厚”诗教的框框。这在古代批评时政的诗歌中是十分突出的。讽谕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诗在表现形式上，多数采用直赋其事的方法。《卖炭翁》、《新丰折臂翁》、《缚戎人》、《井底引银瓶》等，叙事完整，情节生动，刻画人情物态细致传神，对发展中国叙事诗的传统有积极的贡献。另一部分讽谕诗则采用寓言托物的手法，藉自然物象以寄托作者的政治感慨，如《黑潭龙》写家家户户杀猪祭龙王，酒肉实际上喂了狐狸，而深居九重的龙王却什么也不知道，形象地描绘出皇帝耳目闭塞、官吏近侍贪污中饱和小民惨遭剥削的情况。《题海图屏风》则通过海中大鳌兴风作浪、鲸鲵助威肆虐，造成“万里无活鳞，百川多倒流”的景象，为当时藩镇割据、联合叛唐的政治局面作了真实的写照。还有把鹤、鸟、松、竹等动植物拟人化，用以表现社会生活中的各类人物及其关系，如晚年所作《禽虫》十二章，就属于这类寓言诗。无论是直赋其事或寓言托物，一般都概括深广，取材典型，主题集中，形像鲜明，语言明白晓畅。一部分《新乐府》还采用了“三、三、七”言的句式，显示了诗人向民间通俗文艺学习的痕迹。白居易的闲适诗多用于表现闲情逸致，抒写对归隐田园的宁静生活的向往和洁身自好的志趣，不少篇章还宣扬了省份知足、乐天安命的消极思想。但也有一些醒目的警句，如“作客诚已难，为臣尤不易”、“直道速我尤，诡遇非吾志”(《适意二首》)以及“况多刚狷性，难与世同尘。不唯非贵相，但恐出祸因”(《自题写直》)等等，仍从侧面反映出对现实社会的不满，说明他追求闲适，只是无可奈何的自我解脱。闲适诗中也有一些描写自然景物和田园风光的佳作，如《观稼》、《归田三首》，写农村景象，质朴而清新。《游悟真寺诗一百三十韵》，以游记文的笔法依次记叙五日游山的经过，令人有身历其境之感。

阎立本

中国唐代画家。雍州万年(今陕西省临潼县)人，出身贵族。其父阎毗北周时为驸马，入隋后官至朝散大夫、将作少监，对绘画、工艺、建筑都很擅长。兄阎立德亦长书画、工艺及建筑工程。阎立本继承家学，尤长绘画，而且有政治才干，在唐高祖武德年间即在秦王府任库直，太宗贞观时任主爵郎中、刑部侍郎。高宗显庆元年(656)阎立德殁，他由将作大将迁升为工部尚书，总章元年(668)擢升为右相，当时姜恪以战功擢任左相，因而时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驰誉丹青”之说。阎立本具有多方面的才能。他善画道释、人物、山水、鞍马，尤以道释人物画著称，曾在长安慈恩寺两廊画壁，颇受称誉，《宣和画谱》所载宋代内府收藏阎氏作品，道释题材占半数以上。他又工写真，不少肖像画是为了表彰功臣勋业而创作的。武德九年(626)所绘《秦府十八学士图》系表现秦王李世民属下的房玄龄、杜如晦等 18 位文人谋士的肖像，都是按人写真，图其形貌，画卷中对每个人的身材、相貌、服饰、年龄及神情等特征都有生动而具体的刻画。贞观十七年(643)又奉诏画长孙无忌、李孝恭、魏征、房玄龄、杜如晦等 24 功臣像于凌烟阁，成为继汉代麒麟阁、云台画功臣像之后的又一次大型政治性肖像画创作活动。唐代凌烟阁画像早已不存，北宋元佑五年(1090)游师雄曾据流传粉本摹勒上石，现尚有少部分石刻画像流存于陕西省麟游县，计存萧璃、魏征、李绩、秦叔宝 4 像，皆为全身执笏肃立，惜面部形像残毁，据唐代杜甫

《丹青引》中曾咏及凌烟阁肖像为“良将头上进贤冠，猛将腰间大羽箭，褒公(秦琼)、鄂公(尉迟恭)毛发动，英姿飒爽来酣战，”可知是非常传神的。阎立本还曾奉诏为唐太宗画像，后经人传写于长安玄都殿东壁，一时传为名迹。

阎立本的不少创作活动与初唐政治事件有密切关系。据记载，他画过《职贡图》、《西域图》、《外国图》、《异园斗宝图》,都是通过对边远各民族及国家人物形象的描绘，反映唐王朝与各民族的友好关系，从而歌颂政权的强大。他曾画《魏征进谏图》则是表现太宗时名臣魏征敢于直谏，从而歌颂唐太宗善于听取臣下意见的美德；他曾画《永徽朝臣图》，系表现高宗时的大臣肖像；又画《昭陵列像图》，则是树立在太宗陵墓两侧的各族首领石雕像的设计图，可惜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作品没有能够流传下来。现存传为阎立本作品多为摹本。但从中依然可看到他在绘画上的风格特色。《步辇图》(绢本，设色，纵 38.5 厘米，横 129.6 厘米，故宫博物院)是现存阎立本的重要作品。系反映贞观十四年吐蕃王松赞干布仰慕唐王朝典章制度，派禄东赞到长安通聘，要求通过与唐公主和亲而永结和好，受到唐太宗赞许的重要事件。作品描绘了唐太宗召见禄东赞的场面：一侧画太宗坐步辇上，前后由众宫女抬护拥随，另一侧画禄东赞在典礼官导引下谒见，作品成功地刻画了太宗的睿智与喜悦和禄东赞对太宗的敬仰之情，对不同地位、民族、身份的人物都表现得真实得体。全图不画背景，手法简洁，生动地记录了历史上汉藏两族友好关系的盛举，具有高度的历史价值和艺术价值(见彩图《步辇图》(唐))。传为阎立本的作品还有描绘汉至隋代 13 个不同帝王形像

的《古帝王图》(美国波士顿美术馆)、描绘边远民族及国家使臣去唐王朝通聘的《职贡图》(台北故宫博物院)、表现唐太宗派监察御史萧翼以巧计从和尚辩才处赚取王羲之书法名迹《兰亭序》的《萧翼赚兰亭图》(此图有两卷，一藏台北故宫博物院，一藏辽宁省博物馆)。虽然这些作品与阎立本的关系如何尚待进一步研究，但基本上反映了初唐时期绘画的风貌。阎立本在艺术上继承南北朝的优秀传统，认真切磋加以吸收和发展。从传为他的作品所显示的刚劲的铁线描，较之前朝具有丰富的表现力，古雅的设色沉着而又变化，人物的精神状态有着细致的刻画，都超过了南北朝和隋的水平，因而被誉为“丹青神化”而为“天下取则”，在绘画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李思训

中国唐代画家。字建，出身唐宗室。唐高宗时曾任江都令。因武则天执政杀戮唐宗室而弃官隐居，至中宗神龙(705～707)初年又出任宗正卿、历官益州长史，开元(713～741)初年，任左羽林大将，晋封彭国公，后转任右武卫大将军，卒后追赠秦州都督。画史上称他为“大李将军”。李思训善画山水、楼阁、佛道、花木、鸟兽，尤以金碧山水著称。其山水画主要师承隋代画家展子虔的青绿山水画风，并加以发展，形成意境隽永奇伟、用笔遒劲、风骨峻峭、色泽匀净而典雅，具有装饰味的工整富丽的金碧山水画风格。在创作上，李思训除了取材实景，多描绘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和奇异秀丽的自然山川外，还结合神仙题材，创造出一种理想的山水画境界。

李思训的作品，因年代久远，现已罕见。流传至今的《江帆楼阁图》据记载是他的作品，但现仍存有争议。

《江帆楼阁图》，绢本，纵 101.9 厘米，横 54.7 厘米，青绿设色，藏台北故宫博物院。在这幅画上，他以劲利遒韧的线条和古雅绚丽的金碧设色，成功地表现出春天江边的坡岸山崖、绿树楼阁、江水浩渺、渔舟轻荡、游人赏春的优美景色；画面构图疏密有致，虚实相生，不画远处江岸边际，仅以细笔勾出水纹，造成烟波浩渺、江天无尽的境界，从而更富于诗意；山石画法虽略感平实，但树木却分出前后左右，穿插有致，并用双勾法画枝干、树叶；色彩亦较丰富，所有这些都较展子虔《游春图》有了显著的进步，是中国早期山水画的代表作品之一。李思训身为皇室，其作品反映了贵族阶层的审美趣味和生活理想，因当时社会的各种矛盾和佛道思想及文人隐居习尚的影响，也使他在作品中时常流露出一种出世情调。即所谓“时靓神仙之事，窅然岩岭之幽”。李思训的金碧山水画对后来中国山水画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后世山水画中的青绿山水就是对他这一派画风的延续。明代莫是龙和董其昌等人提出绘画上的南北宗论，则将他列为“北宗”之祖。李思训之子李昭道，玄宗时期曾任太原府仓曹、直集贤院，官至中书舍人。善画山水，继承家学，并能变父之体，有所创新，造诣精深，后世称之为“小李将军”。李昭道的作品现很少见到，传为他的《春山行旅图》、《明皇幸蜀图》等，可能系后人摹本。

吴道子

中国唐代画家。后改名道玄，尊称吴生，阳翟(今河南省禹县)人。少孤，生活贫寒。早年为民间画工，年未弱冠，穷丹青之妙。神龙年间(705～707)事逍遥公韦嗣立，为小吏。景龙年间(707～710)任兖州瑕丘(今山东省滋阳县)县尉，不久坚辞而去。以后，他浪迹东都洛阳，曾学书于张旭、贺知章，后专工画，并在寺观从事壁画制作。开元年间(713～741)他被唐玄宗召入禁中为宫廷作画，先后任供奉、内教博士，官至宁王友。他奉诏绘制了一些历史画或政治性肖像画(如《金桥图》)，同时常在长安、洛阳作壁画，观者如堵，名声广播。

天宝年间(742～756)，他奉诏游蜀归来，在大同殿画出嘉陵江三百余里旖旎风光。玄宗因之称羡道：李思训数月之功，吴道子一日之迹，皆极其妙。758 年以后，其事迹不详。吴道子活跃于盛唐，在这个国势强盛、经济繁荣的时期，文学艺术空前发展。中外文化交流、各艺术门类的沟通，为他的艺术成就奠定了良好的基础。他喜与文人名流交往，又游历各地，在绘画上远师张僧繇，近法张孝师。早年作画行笔流丽纤细，继承六朝风范；中年后笔迹磊落逸势，高度成熟。他兼善人物、佛道、神鬼、山水、鸟兽、草木、台殿等各类题材，尤以人物、佛道见长。他在长安、洛阳两京寺观所作壁画，曾达 300 余堵，并且奇踪异状，无有同者，其《地狱变相》名振一时。

吴道子在艺术上富有创造精神，一说山水画之变由

需要全本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